

江南地区杨老爷信仰的民间叙事研究

钱怡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杨老爷信仰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通过聚焦于杨老爷信仰的民间叙事，旨在呈现民间叙事中杨老爷形象流变过程，解答其形象如何从文献记载中的幽冥文官演变为民间狰狞可怖的黑脸武将形象。杨老爷形象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深植于民众的口头叙事与仪式实践，民众将多种神灵母题不断附会于杨老爷一身，使其从瘟神逐渐发展为全能神。杨老爷信仰的动态演变历程，生动体现了民间叙事与仪式实践在塑造地方神灵形象中的决定性力量。

关键词：杨老爷；民间信仰；民间叙事；文艺仪式

DOI：10.64216/3104-9672.25.02.035

杨老爷信仰是江南地区的一种的地方神祇崇拜。其信仰范围覆盖上海及周边地区，包括上海青浦、松江、嘉定、浦东、金山，江苏吴江、同里和浙江嘉善等地。杨老爷最初是保障赋税公正的“杨大神”，后演变发展为渔民尊奉的水上保护神。^[1]并在民间叙事中衍生出驱瘟、治病等多重职能，成为回应民众生存焦虑的全能神。在当代杨老爷信仰仍然维系着地方社区的认同与情感纽带，展现出民间信仰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关于杨老爷信仰的原型，查阅元明时代成书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能够发现一位叫做“杨元帅”的神灵，生前担任汉朝的廷尉，由于执法严明、刚正不阿，死后获入岳府仙班，担任“隍府碣门之长”^[2]，即负责羁押、审讯亡魂。在配图中，杨元帅一副文官模样，身侧侍立着手持钢叉的牛头，也与其“隍府碣门之长”的职务相符。然而在清代松江人董含的笔记中却记载其“神像狰狞可畏”^[3]，在今天的许多供奉杨老爷的庙宇中，也能发现其造像通体发黑，十分威猛。那么，杨老爷的形象是如何从一个文官演变为狰狞可怖的武将形象？

对于这一问题，历史学者王健曾尝试从道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解释。他指出杨老爷的形象可能是结合了《正统道藏》中出现的一位擎羊杨使者的力士形象。^[4]本文认为，除了道教的影响，杨老爷作为一名草根神灵，其信仰长期流传于民间，必然会受到民众的口头叙事和

仪式实践的影响。通过梳理和考察杨老爷的民间叙事，可以发现杨老爷狰狞可怖的形象与其在民间作为瘟神的神职有密切的关联。并且在民间的讲述中，杨老爷形象不断丰富，最终发展为水神、医神、地方神多位一体的全能神。

1 危机·死亡·成神：杨老爷的成神叙事

查阅上海各区县的民间故事集成，以及前人搜集整理的记录本和田野调查报告。不难发现，关于杨老爷的成神叙事，各地的文本均呈现出同质化的叙事类型，即以“杨老爷变黑脸”叙事类型为核心。

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些民间叙事的内在形态结构，归纳出杨老爷成神叙事的模式。本文将运用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杨老爷的民间叙事进行分析。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指出，“一个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5]而“母题”则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6]可以说故事类型正是由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母题构成的。

通过对杨老爷成神叙事的情节内容进行母题的拆分和归纳，可以总结出这一类叙事中的常见的母题有：
A. 危机降临（A1 水中投毒 A2 外敌入侵 A3 外敌入侵并水中投毒）
B. 异常死亡（B1 服毒代死 B2 捐躯赴难）
C. 受封成神（C1 立庙祭祀 C2 出会纪念）。“杨老爷变黑脸”类叙事的情节基于见下表：

图表 1 “杨老爷变黑脸”类叙事情节基干

序号	故事名称	情节基干	流传地区
1	《杨老爷出会》 ^[7]	A1+B1+C2	松江泗联
2	《杨老爷为啥黑脸孔（之一）》 ^[8]	A2+B2+C1	嘉定南翔
3	《杨老爷为啥黑脸孔（之二）》 ^[9]	A3+B1+C1	嘉定南翔
4	《杨王老爷的来历》 ^[10]	A1+B1+C1	嘉兴嘉善
5	《杨老爷赴宴被毒杀》 ^[11]	A3+B1+C1	青浦练塘

母题 A. “危机降临”是杨老爷变黑脸类叙事发生的重要前提。受到叙事讲述主体和讲述背景的影响，“危机降临”这一母题又可以分为 A1 “水中投毒”、A2 “外敌入侵”、A3 “外敌入侵并水中投毒”。A1 “水中投毒”通常讲述阎王爷指派小鬼向井水中投放瘟药，或为害一方的恶霸在杨老爷的酒水中投毒。A2 “外敌入侵”通常讲述金兵南下侵犯江南地界。A3 “外敌入侵并水中投毒”则是结合了前两者，讲述金兵在井水中投毒。

母题 B. “异常死亡”是杨老爷变黑脸类叙事的中心母题。又可以分为两大枝干，分别是 B1 “服毒代死”和 B2 “捐躯赴难”。前者通常讲述杨老爷喝的井水或酒水中被小鬼/金兵/恶霸投毒，为了防止更多无辜百姓受到牵连，杨老爷选择舍己救民，饮鸩身亡。后者则讲述杨老爷在带领渔民与金兵交战的过程身先士卒，不幸阵亡。这一母题在叙事中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一方面杨老爷牺牲自我后以尸体变色作为示警，阻止民众引用有毒的井水，成功解救民众；另一方面，尸体变黑宣示着这场死亡的灵异性乃至神圣性。

母题 C. “受封成神”是这类叙事的必然结局。围绕这一母题又生发出 C1 “立庙祭祀”和 C2 “出会纪念”。民众通过将杨老爷崇奉为地方神灵，将杨老爷死亡的悲剧转化为“大团圆”结局，实现象征层面的情感补偿。此外，民间认为异常死亡者的鬼魂滞留人间，可能造成威胁，需要加以安抚。因此对杨老爷加以供奉也符合底层民众趋利避害的实用逻辑。

通过对这类叙事中常见母题的归纳，可以抽绎出“危机降临——异常死亡——受封成神”的母题链。其中，“异常死亡”是中心母题，既承接并解决了突然降临的危机，又使杨老爷完成了由人至神的转变，直接导致结尾民众对神灵的供奉。李丰楙曾将瘟神传说归纳为“服毒代死型”与“地窖误杀型”两大类型。^[12]“杨老爷变黑脸”类叙事无疑属于瘟神传说的“服毒代死型”，这类叙事的深层结构都是讲述非自然死亡的冤魂受封成神。

杨老爷的成神叙事体现了民众对于危害社区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的焦虑与恐惧。“水中投毒”投射出民众对精怪邪祟所代表的超自然力量可能引起的瘟疫和疾病的恐慌，“外敌入侵”和“豪强作恶”则关乎地方民众的领土安全，在象征层面二者都属于社区的安全阈限被打破的情况。而杨老爷通过异常死亡实现了对社区边界的修复，以个体的牺牲换取了集体的生存。在杨老爷成神后举行祭祀和出会，则是在仪式中再现神灵对于社区边界的维护。

在这类叙事中，杨老爷所展现的瘟神神格值得关注。“变黑脸”是杨老爷作为瘟神的特征。对于瘟神神像的狰狞可畏，刘枝万认为是“影射罹疫临死时挣扎之恐怖状”。^[13]而广田律子则认为，民众在祭祀瘟神时为了赋予他们能够战胜灾难的形象，而将其风貌表现得狰狞恐怖。^[14]瘟神黑面獠牙的恐怖面容，实为通过模仿邪灵样貌来震慑、压制疫病。也就是说，在杨老爷狰狞可怖的形象背后暗含“同类相克”“秽物驱邪”的原始巫术思维。

杨老爷凶狠的外表，使其具有了辟邪之力。尽管有时“黑脸”会让人感到恐惧，但这更能说明其驱邪效果一流。比如光绪七年（1881）《申报》的一则报道非常直观的展现了杨老爷所具有的震慑作用：一名宝山人夏某，午后因天气炎热，遂到大王庙中午睡，见到庙中供奉的杨老爷青面长须立于面前，感到“不胜惊骇，顿发冷汗”，回家后身体不适，第二天便暴毙而亡。^[15]杨老爷的黑脸所带来的震慑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2 驱疫禳灾：民国时期的杨老爷出会仪式

民间叙事不仅仅是口头流传的传说故事文本，也包括仪式这种具身化的叙事形式。民众的信仰实践就是信仰叙事的“行动场”。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6]文艺仪式是对口头叙事的展演与强化，在仪式过程中通过对叙事核心元素的具身化展演，构建出关于神灵的民

间叙事的戏剧场景,让信众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直观感受到神灵的威严和故事,从而维系信仰。

查阅近代报刊,《申报》《新闻报》等报纸曾多次报道杨老爷出会驱逐瘟疫的事件。通过考察这些报道中的出会仪式,可以发现这些文艺仪式就是对上述“杨老爷变黑脸”类故事的现实演绎。正如陈泳超所说:“仪式文艺具有鲜明的功能导向,其叙事常与文本外的仪式实践相互映射。”^[17]杨老爷的出会仪式与瘟神叙事呈现相互映射的关系。

在1919年的浦东,瘟疫蔓延,于是洋泾镇的会首请出杨老爷游行街市,驱逐瘟神。这一场赛会举办得尤其成功,有效地宽慰了百姓恐慌的情绪:

浦东时疫蔓延甚烈,迷信者皆言镇西定水庵杨老爷黑面有威,能驱时疫,爰定于阴历二十六日起,按日赛会。会中各会首数日前已议定驱疫之事,并预先出示布告,贴满于洋泾镇各处,大致谓:“昭天侯杨府大神,准于阴历二十六日出轅到坛,驱瘟除疫,人口太平,全境平安,使瘟神见之,早日回避”云。

坛设贾家角。杨老爷二十五日下午已到坛。设坛者,特聘大法师召神召将,翌日协同杨老爷回洋泾,游行街市,共驱疫病云。

赛会驱疫时,雇乞丐作瘟神状,见杨老爷来,伪作逃避。赛会诸人抢轿追逐,悉为戴红黑帽者所捉,即解至神前,法师代为定罪。观者始拍掌欢呼相庆:“时疫不日即可除尽!”……^[18]

这篇报道讲述了出会的整个流程,并详细描绘了赛会驱疫的场景:乞丐将自己扮成瘟神的模样,伪作躲避,这一仪式明显是对傩仪的模拟。这个场景让人想起《左道》中提到一种名为“钟馗戏”的驱邪仪式,通常在宋朝的除夕夜举行,在这个仪式中乞丐将自己装扮成钟馗或其诸鬼,然后敲锣打鼓地在京师街道上游行,并在每家每户门前驻足乞讨,以期从受到惊吓的人手中勒索钱财。^[19]在杨老爷出会仪式中的乞丐,如同他们自身所扮演的瘟神、疫鬼,是社会结构中的“异物”,亟需排除出共同体,以维系共同体的安全。正如勒内·基拉尔所指出的“替罪羊机制”,共同体将内部危机归咎于“异物”,并通过集体暴力转移内在矛盾,从而恢复秩序。杨老爷的出会仪式实际上是对社区边界再次确立。

另外,在这场出会仪式中,杨老爷已经从瘟神发展出保境安民的地方神功能,而其本来的瘟神角色则由乞丐代替。也就是说,瘟神信仰中“疫鬼”的邪神一面已

经逐渐从杨老爷身上剥离,在杨老爷身上留下的是瘟神被除灾难、祈愿平安的正神一面,而这一面又与保境安民的地方神神格发生了重合。

另一则《杨老爷驱疫出会》的报道中,仪式结束时还有“送纸船”的环节:

入夏以来,天时不正,疫病盛行。俗谓杨老爷系驱瘟神,故日前自浦东出迎后,初二日又在浦西各街道行迎。前后点缀,一如前清之三节会式。惟最后殿以极巨之纸轮船一艘,船首大书“顺风相送,直抵东洋”八字,见者无不抵掌大笑。^[20]

这一舟船逐疫仪式是对于维护社区阈限的现实演绎,将疫鬼赶至人类社群边界之外是瘟神信仰中的一个常见母题。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舟船逐疫仪式是瘟神信仰的一大特征,例如浙江的温琼信仰、陈靖姑信仰,福建的五帝信仰,中国台湾地区的王爷信仰等等,都是以地方神祇为基础的瘟神信仰的发展。在这些信仰的仪式中也都有送纸船驱疫的环节。

通过这些近代的报刊材料,可以发现在民国时期杨老爷的出会仪式中,尽管仍有“押解瘟神”“送纸船”等驱逐瘟疫的环节,但杨老爷的神格已经开始向保境安民的地方神发展。驱疫禳灾的仪式也被纳入更广泛的信仰体系之中,乞求地方民众的无病无灾、生活和顺。

3 箭垛式的神灵:从瘟神走向全能神

民间叙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民众在对杨老爷故事的讲述中,不断吸纳其他的神灵母题,赋予其生生不息的动力。由于杨老爷作为地方保护神的特质,民众将各种零散的传说和故事投射到杨老爷身上,使杨老爷成为了“箭垛式的神灵”。

这些叙事实践一方面凝聚了江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与期望;另一方面又结合了杨老爷作为地方神灵的特质,使其形象不断丰满,逐渐从驱瘟神发展为全能神。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市卷为底本,归纳出杨老爷形象中的三个箭垛性特征:水神、医神与地方神。

首先是杨老爷作为水神的形象,是对应于渔民群体的现实需求发展而来。在南翔地区流传的《杨老爷显灵》^[21]中,讲述了杨老爷在风暴中指引迷途渔民脱险的故事,反映出靠海为生的渔民群体面对风暴等自然力量时的恐惧和无助,因此他们往往诉诸于信仰。南翔的《杨老爷嫖堂子》^[22]则讲述了杨老爷护佑妓女的故事。一则明

清时期,疳民、九姓渔民中,妇女迫于生计而从事娼业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杨老爷可能从渔民信仰发展为妓女群体的信仰对象。二则杨老爷光顾妓院的情节,体现出其瘟神信仰底色中作为“疫鬼”的邪神一面。

其次是杨老爷作为医神的形象,回应了江南民众对瘟疫和疾病的恐惧。江南地区人口密集、水系发达,是瘟疫易发地区。面对瘟疫和疾病,民众或延医诊治,或祈神禳灾。宝山罗店的《杨王老爷看病》^[23]讲述了杨老爷医治好商人妻后,商人到杨老爷庙中烧香酬谢。金山张堰的《旧港杨老爷庙》^[24]则讲述了杨老爷显灵治愈富商之子后,富商变卖家产为其建庙。在瘟疫频发、疾病难愈的情况下,民众通过将杨老爷建构为一个妙手回春、分文不取的医者,以解决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焦虑。杨老爷信仰由瘟神信仰进一步发展为医神信仰,也是顺理成章。

最后是杨老爷作为地方神的形象,在民间叙事中杨老爷常常以清官形象示人,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正义的诉求。浦东新场的《杨社庙的神船》^[25]讲述了杨老爷乘坐神船代天巡狩,拯救了溺水的周孝子,并惩治了其兴讼夺产的叔叔周老五。杨老爷的举动有力维护了宗法社会的秩序。金山朱泾的《杨老爷巧断脸盆案》^[26]是一则典型的“智慧断案”故事,讲述了杨老爷明察秋毫,以巧妙的计策侦破案情,最后从轻发落罪犯,并归还了民众的铜元。满足了民间对官员“智”与“仁”的双重期待。民众通过创作和传播这样的故事,在杨老爷身上寄托了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渴望,传递了“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

由此可见,在民众的口头传播中,通过将不同的母题嫁接、附会到杨老爷身上,使其完成了从驱瘟神向全能神的转变。于是杨老爷在接替瘟神的职能后,又具备了水神、医神和地方神的神职。杨老爷的神格发展,正符合刘枝万提出的“瘟神信仰的六个阶段”论^[27]。

民众的讲述为杨老爷的民间叙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在叙事的建构和发展中的所运用的重要法则是“同名类聚”法则。王尧在分析山西“二郎”传说时,指出以“二郎”这一神号为名的神灵之间存在彼此同化和吸纳传说母题的现象,即神灵传说的“同名类聚”现象。^[28]在江南地区,有一系列的神灵称谓中都含有“老爷”二字,除杨老爷外,还有大老爷、七老爷、晏老爷……这些神灵具有不同的传说和形象特征,但是却都被信众称为“某老爷”。更重要的是,这些老爷神

发展出了相似的神格,都具有水神、医神、地方神的功能。

尽管在不同的叙事文本中,杨老爷的名字并不相同,有杨滋、杨镇、杨义等。但江南民众在讲述这些以“老爷”为神号的杨姓神灵传说时,可能出于对“老爷”这一称谓中所包含的地方百姓与管辖当地的地方官之间的从属感,将不同的传说母题加以融合,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中对地方神灵的需求和期待。而在杨老爷身上不同母题的汇聚与融合,又反过来扩大了以杨老爷为代表的江南“老爷”类神灵的影响力。

4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杨老爷信仰的民间叙事,梳理出杨老爷的神格在民间叙事中由瘟神发展为水神、医神、地方神,并最终成为全能神的过程。由此可见,杨老爷的形象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幽冥文官,演变为庙宇造像中“狰狞可畏”的黑脸武将,正是出于其作为瘟神驱瘟辟邪的功能需要。其形象转变的核心驱动力并非单一的道教影响,而是深植于江南社会中的民间叙事与仪式实践。

综上所述,杨老爷信仰并非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文化符号,而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动态演变过程。这一演变历程生动地表明,民间信仰的生命力恰恰来源于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刻互动。民众的口头讲述与仪式实践,不断地为神灵形象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得以跨越时空,在当代依然焕发着活力,成为理解江南地域文化与民众精神世界的一把关键钥匙。

参考文献

- [1] 参见王健. 利害相关: 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10—235.
- [2]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14.
- [3] (清)董含. 莼乡赘笔. 丛书集成续编(第96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60.
- [4] 参见王健. 利害相关: 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18.
- [5] (美)斯蒂·汤普森著. 郑海等译.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499.
- [6] (美)斯蒂·汤普森著. 郑海等译.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499.
- [7] 罗杨总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上海·松江卷[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72.

[8] 费翔宝主编. 上海市嘉定县民间故事集成·南翔集成本[Z]. 1987: 1.

[9] 费翔宝主编. 上海市嘉定县民间故事集成·南翔集成本[Z]. 1987: 2.

[10] 金天麟. 浙江嘉善县地方神记略. 参见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上海民俗学会主编. 中国民间文化(18)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83.

[11] 郑土有, 纪秋悦编著. 青浦淀山湖传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167.

[12] 李丰楙. 行瘟与送瘟: 道教与民众瘟疫观的交流与分歧. 参见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台北: 汉学研究中心印行. 1994: 399.

[13] 刘枝万. 中国台湾地区民间信仰论集[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5: 232.

[14] 参见(日)广田律子著. 王汝澜, 安小铁译. “鬼”之来路: 中国的假面与祭仪[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5—26.

[15] 急病类志[N]. 申报. 1881-08-05(0002).

[16] (美)保罗·康纳顿著. 纳日碧力戈译. 社会如何记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0.

[17] 陈泳超. 论仪式文艺的功能导向[J]. 民俗研究. 2023(2): 99.

[18] 山人. 驱时疫杨老爷赛会[N]. 新闻报. 1919-07-25(0013).

[19] 参见(美)万志英. 廖涵缤译. 左道: 中国宗教文化

中的神与魔[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33.

[20] 子彝. 杨老爷驱瘟出会[N]. 新闻报. 1919-07-31(0013).

[21] 费翔宝主编. 上海市嘉定县民间故事集成·南翔集成本[Z]. 1987: 3.

[22] 费翔宝主编. 上海市嘉定县民间故事集成·南翔集成本[Z]. 1987: 4.

[23] 宝山区民间文学集成乡镇卷编委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卷·宝山区乡镇分卷[M]. 1989: 58—59.

[24] 白庚胜总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金山卷[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196—197.

[25] 罗杨总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上海·南汇卷[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73—75.

[26] 白庚胜总主编.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金山卷[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319—321.

[27] 刘枝万. 中国台湾地区民间信仰论集[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5: 226.

[28] 参见 Wang Yao. *Assimilation by Names: A Mechanism of Pantheon Development in Local Religion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Text and Acts, 189-210*.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3.

作者简介: 钱怡(2001—), 女, 上海青浦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民间文学。